

专题

← (上接 7 版)

有爱国精神的校长黄绍兰的影响下，学校师生积极参与到进步的革命行动中。

1919 年 5 月 6 日，上海的报纸开始报道五四运动爆发、北京学生斗争的情形，上海各学校、各团体纷纷发出通电，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。5 月 8、9 日下午，上海各学校代表在复旦大学召开预备会，讨论组织学生联合会事宜。博文女校与上海女子中学等 12 所女子学校加入。5 月 11 日，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。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继续镇压学生运动，并迫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，北京学生于 5 月 19 日罢课。上海学生立即响应。5 月 26 日，上海公私立中等以上男女学校的学生 2.5 万人齐集在西门公共体育场，举行罢课宣誓典礼，会后举行游行示威。罢课之后，上海学联发动各校学生进一步推动商界抵制日货。博文女校的学生将拍卖手工艺品所得的钱，作为活动经费，举行了救伤及看护练习。（上海市妇联妇运史编纂委员会编《上海妇女运动史（1919—1949）》）

5 月 31 日，上海学联在公共体育场召开追悼郭钦光烈士大会。郭是北大学生，在五四运动中与军警斗争，呕血而死。会场上男女学生万余人从容驻立，学生联合会会长何葆仁、北京大学许德珩等分别进行了演讲、报告。在各女校唱追悼歌后，全场各校莅会者整队游行至南市，博文女校学生亦在其中。各队游行时，手持爱国会的白绫小旗，上绘一五色旗，旁注爱国同胞勿用日货字样。追悼会后，学生们又向各商店宣传罢市。博文女校的教职员李果、程孝福、钟道英等女士，与勤业女校的朱剑霞作为代表晋谒商会会长。李果副校长表示现在只有抱定牺牲主义：学界牺牲光阴、牺牲生命，商界也应该在获利上有所牺牲。在学生的积极努力下，上海商界于 6 月 5 日宣布罢市。

在五四爱国运动中，博文女校的师生还参与创办了“上海女界联合会”这一重要的妇女运动组织。1919 年 6 月 5 日，博文女校等女学生在女子救国会全体干事率领下至街头演讲，6 日下午，女子救国会干事陆蕴玉在霞飞路散发传单宣传被拘，在法租界捕房陆对翻译申以大义而获释。7 月 11 日，钮永健夫人黄梅仙、博文女校校长李果等发起成立上海女界联合会，址设博文女校，黄梅仙、李果分任会长、副会

长。7 月 15 日，上海女界联合会举行演讲，郑璧演讲《亡国铁路》，李果讲演《虎列拉（即霍乱病）之状况及预防法》，积极宣传爱国与科学。（见上海地方志网页“卢湾区志—群众团体—妇女团体”）

女界联合会于博文女校召开的第三次筹备会上，制定了该会的简章，“定名为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”，声明“本会以竭女子之知能，启发国民之自觉，提倡社会服务为宗旨”。同时确定“本会事务所暂假法租界贝勒路博文女校内”。后女界联合会于 1919 年 9 月 15 日迁入霞飞路 358 号。上海女界联合会是“以上层知识妇女为主要成员”的爱国团体，与中华女子救国会等一起，开展“爱国宣传、抵制日货、兴办平民教育”等活动。博文女校的副校长李果热心社会事务，担任上海女界联合会旬刊总编辑。1919 年 5 月，为商议山东问题应对办法，留日学生暨京津学生均派代表来上海，联络各界进行国民大会。在 5 月 15 日的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集会上，李果进行了演说，号召上海各界团结一致，与全国共同行动，同心御辱，以挽救国家之危亡。李果还参加了 11 月 29 日在松江召开的国民大会，到会者有各界联合会、商界联合会、女界联合会、学生联合会等团体，以及各男女学校代表。在这次集会上，李果作为上海女界联合会的代表发表了演说，主张家庭演讲，唤醒国人迷梦，一致对外。后各团体代表均发表了演说，并赴市街中游行。女界联合会及与会各女校仍留下，李果再次发表演说，侧重阐述了教育的目的，“谓我侪须打破日本式之女子教育，勿仅仅以贤母良妻自居”。李果因工作繁忙，外出演讲中又遇了风寒，不幸患肺病，于 1920 年 1 月 26 日逝世。上海各界人民还为她开追悼会，称赞她是妇女界的“指导良师，互助益友”。

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，把妇女解放问题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，立即改组了上海女界联合会，定名为“中华女界联合会”，“以拥护女子在社会上政治的及经济的权利，反抗一切压迫为宗旨”，并以该会名义创办《妇女声》半月刊，指导妇女运动。1925 年 1 月，为避免与各地女界联合会名称混淆，同时为更便于联络各国妇女协会团体，增强社会影响力，中华全国女界联合会改名为“中国妇女协会”，黄绍兰等 9 人被推举为筹备委员。

其后，博文女校亦未缺席近代中国历次重大的革命活



上左、上右：博文女校所在地太仓路 127 号楼上西厢房（1971 年 3 月毛泽东卧室布置草样）



左图：博文女校所在地太仓路 127 号楼上东厢房（一大代表董必武居住的房间）

动。如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，黄绍兰以博文女校校长身份，参与到上海妇女界慰劳伤病军人的筹备工作中。在 30 年代的抗日浪潮中，黄绍兰代表博文女校参加了中华妇女救国大同盟，发表安内攘外意见书，希望国民政府集中救国人才、实现全民政治；惩办不法贪污；修明内政；公开统一的外交；公开翔实的财政。黄绍兰领导下的博文女校师生经常参加各种社会进步活动，却被国民政府视为眼中钉，“黄侃和黄绍兰均是国民党元老，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甚为密切，所以，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不了她。直到 1933 年，国民党市党部才以‘设备简陋’取消该校”（《黄绍兰与博文女校》）。

博文女校与中共“一大”

1921 年 7 月 23 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。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 13 名代表出席。他们是：上海的李达、李汉俊，武汉的董必武、陈潭秋，长沙的毛泽东、何叔衡，济南的王尽美、邓恩铭，北京的张国焘、刘仁静，广州的陈公博，旅日的周佛海，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。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（今兴业路 76 号）李汉俊之兄李书

城的住宅内。“到会的代表们，除原住在上海的人以外，都住在嵩山路一个三楼三底的博文女校里，因为当时正放暑假。”（李达《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》）

关于博文女校是怎么被选作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宿地的，学界至少存有三种说法。一说是李汉俊联系的，他的住处邻近博文女校，他的新嫂子薛文淑当时就在那里求学，应当了解学校放假校舍空置的情况，李汉俊又与女校长黄绍兰有同乡之谊，不难商量。二说是李达夫人王会悟（王还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、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——引者注）联系的，她当过徐宗汉的秘书，而徐宗汉又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。缘此，王会悟与黄绍兰相熟，熟人好办事。三说是董必武与黄侃有同学之谊，当时黄侃任教于武昌高师，董必武通过黄侃致信黄绍兰，称北京大学的一些师生要利用暑假到上海旅游，希望能借博文女校小住。随后，再由李达（一说王会悟）出面，与黄绍兰晤谈商定租借女校之事。（吴客《博文女校：中共一大附会场还是代表们食宿地？》）

据包惠僧回忆，选定博文女校为代表住宿处后，付了两个月的租金，其实住了 20 天左右。“当时我们租这个房子是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的。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（应为黄绍兰——引者注）校长接洽的。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，

……很清静。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。”（包惠僧《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几点回忆（摘抄）》）“当时居住在博文女校的中共一大代表有毛泽东、何叔衡、董必武、陈潭秋、王尽美、邓恩明、刘仁静、包惠僧、周佛海等 9 人，他们全部住在该校的楼上。”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、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、上海毛泽东旧居编著《毛泽东在上海》）1921 年 7 月 22 日，即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的上海的第二天，在博文女校楼上代表们开过一次碰头会，按包惠僧回忆录的说法是“预备会”，而陈潭秋说是“开幕式”。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，“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，我们在里间开会，她坐在外面的凉台上”。清静的博文女校，为居住其中的代表们提供了思索和讨论的场所。代表们在这里聚会、交流、讨论，同时又规划、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，在这里计划着中国的未来，活动时间之长，内容之重要，是不容忽略的。博文女校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住宿地，也可以说是中共一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博文女校的活动，积极配合了兴业路的正式会议，其意义与历史价值是非常重要的。

（作者为中共“一大”会址纪念馆副研究馆员，除已标注外，本文写作综合参考了《华国月刊》《申报》《教育周报》《中华妇女界》《民国日报》《新青年》等材料） ■